

真如丛书

妙灵主编

方广锬



著

渊源与流变

印度初期佛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真 如 丛 书 |

妙灵 主编

方广铝 ● 著

渊源与流变

印度初期佛教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渊源与流变: 印度初期佛教研究 / 方广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真如丛书/妙灵主编)

ISBN 7-5004-4378-1

I. 渊… II. 方… III. 原始佛教-研究-印度
IV. B949.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194 号

责任编辑 施 言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芒 仁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 页 2

字 数 196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佛教从印度东传以来，在中华大地生根、发展，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至今绵延不绝。从东汉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与格义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初扬时期，其结果是以某一经论为核心而形成了部分学派；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宗派大成的阶段，华严、天台、禅宗等宗派的形成，表明了印度佛教在理论思想上的全部中国化。而宋元之际的佛教，又以禅、净为主流，进入佛教中国化的鼎盛时期，在民间发生了全面影响。到了明代，圆融的思潮已经成为佛教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

清末民初，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回归印度佛教的思潮，以欧阳竟无、太虚大师为代表。今天，世界形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在呈现出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思想、文化、学术之中，多元文化互相渗透，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又有东西文化的辩论，中国文化面临着转型与重组。古老的佛教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继续传统、发扬光大，如何与时俱进，已经成为当今佛教界的最大课题。

历史早已说明，佛教的发展与弘扬，不可能超越于时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济、学术之外。虽然 20 世纪

的中国佛教曾经面临着西方文化以及政治、经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在—批高僧大德、檀那信众，以及社会人士的关心、支持和努力下，最终艰难地度过—个世纪，现在正在朝着健康的轨道上运转。

佛教从来都是—个讲智慧的宗教，尤其重视智慧的解脱，在思想方面它曾经对中国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高僧大德、学士文人都非常看重义理的建设，他们撰述著作、注释经论，佛教的义理之学才得以发扬光大。从历代僧传的体例来说，“义解”排在“译经”之后，“习禅”、“明律”之前，可见学术研究在中国佛教里所占的重要地位。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晨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但是这一形式，又使佛法的“义解”与近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了一定的差异。

学术研究作为—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突显了佛教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但是，佛法还有自己的宗教性与神圣性。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往往对佛法的理解上有其优越性。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

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所以，加强佛教界与学术界的合作，对于推动佛教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些年佛教界一直忙着修复寺院、佛像开光、旅游接待，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同时，由于教界人才的凋零，青黄不接，兴办佛学院成为中国佛教的一条出路。如今，二十年过去，人才紧缺仍然是佛教界的最大困惑。如何培养人才、引进人才，是佛教发展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重要课题。佛教文化与文化的佛教是一回事，佛教文化需要现代化人才，文化的佛教也在呼唤人才的到来，佛教在社会的普及程度、观感，社会大众对佛教的理解水平，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

真如寺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恢复重建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至今仍然有许多建筑需要修建。我主持真如寺以后，在政府有关部门、四众弟子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有限的成果。但是，梵刹庄严，金像重光，只是一种外在的形象，佛教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文化内涵。由于这一点，真如寺在经济极其紧张的情况下，仍然非常重视文化建设，每周举办讲经活动、收藏名人书画、出版画册等等。

我于 1944 年出家，曾在上海佛学院读书，后来又在全国各大丛林参学。改革开放后，参与上海佛学院的工作，教书育人，一辈子都在从事着佛教文化教育事业。在寺务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仍然坚持每周为信徒讲经，有时还到国内外从事一些弘法活动，闲暇之时，自己也写一些东西，文字因缘初衷不改，爱好佛教文化从未改变。

这次，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有意组织一套佛教丛书出

版，旨在推进佛教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我虽然已经年老，但是对于佛教文化之事，亦不敢推卸，只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尽力促成此事。真如寺决定今后每年都将拿出一定的资金资助佛教研究的事业，帮助学者出版有关佛学著作，鼓励法师、学者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为的是将中国佛学推向世界。

本丛书的编辑方针是将佛教进行整体研究、契时而不过时，着重突出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始资料的建设：包括藏外文献的整理，重要文献的校注，近现代佛教文献的整理出版。

2. 鼓励出版佛教研究的热点，同时加强资助目前中国佛教研究的薄弱点：如戒律、清规、礼仪等。

3. 南传佛教、藏传佛教。

4. 国外优秀佛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发展佛教文化是一项长久的事业，需要巨大的恒心、愿心。真如寺一年资助四本书出版，数量虽不算多，但是如果长期坚持下来，经过十年、二十年乃至百年，亦可成洋洋大观矣！滴水归海而不失，佛教的发展正是由点滴事情作起。只要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四众弟子重视文化事业，专家、学者能够共襄盛事，佛教文化焉有不流传耶！

妙靈

2002年6月1日

于上海真如寺方丈室

关于印度初期佛教研究的 几个问题（代序）

佛起源于印度。印度佛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作初期佛教时期、初期部派时期、初期大乘与中期部派时期、中期大乘与晚期部派时期、晚期大乘与晚期部派及密教时期。印度初期佛教，是全部印度佛教的根基，也是全部佛教的根基。由此，印度初期佛教在全部佛教研究中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近二十年来，我国在印度初期佛教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仍有不少领域需要开拓；已经开拓的领域，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在此拟对初期佛教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想法，以求教于先进与同好。

一、定名

中国人传统重视“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搞学术研究则首先应该重视研究对象的定义，即从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对研究对象作一番界定。从内涵方面讲，定义应当能够简洁、明了、正确地概括与反映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从外延方面讲，定义应当能够恰好覆盖它所论述的对象的势力范围：既不能跨马持枪冲进别人的领地，也不能留下一块地盘不闻不问。定义的结果即反映在定名中。

我国古代或者用小乘、大乘，或者用声闻乘、菩萨乘、佛乘，或者用各种判教理论从各个方面对印度佛教进行分判。由于分判的角度与立场不同，因此，上述分判虽然各有其道理，却都不是我们今天要求的科学意义上的分期，故其名称也无法为我们今天直接采用。比较而言，小乘、大乘的分判法较为符合历史实际。如果我们舍去“小乘”这一称呼固有的贬义，则传统所谓的“小乘”既可以指佛教发展的阶段，也可以指佛教的派别，范围比较宽泛。当它表示佛教发展的阶段时，包括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初期佛教、初期部派佛教等两个时期；当它表示佛教的派别时，则除了上述两个时期中活动着的全部佛教派别外，还包括活动于大乘时期的不少小乘派别。因此，我们显然不能用“小乘”来指代初期佛教。

近代以来，西方与日本的学者在佛教研究的实践中，认识到部派分裂以前的佛教有其特殊的性质，应该将它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来加以研究，从而产生定名的必要，并先后提出“原始佛教”、“初期佛教”、“早期佛教”等名称。这些名称也传入我国，为我国的学术界所沿用。但我国学者在沿用这些名词时，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分析与界定。有的研究者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不加区分地交替出现上述名词，似乎这些名词先验地完全等价。其实，仔细分析，上述三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我认为，“原始佛教”这个名称中的“原始”两字，附加了某种价值的判断，值得斟酌。

我们知道，在宗教学研究领域，“原始”这个词有其特定的含义。学术界对“原始宗教”是否算做宗教，曾经有过

热烈的讨论，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无论如何，原始宗教，亦即自发的宗教与其后的人为宗教有着许多本质的不同，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那么，我们能不能由此推衍，说原始佛教就其本质特征而言相当于原始宗教，与其后的其他佛教发展阶段有着许多本质的不同，甚至说原始佛教不算佛教呢？这显然并不合适。

即使撇开“原始”一词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的特定含义与用法不谈，就该词的一般含义而言，该词除了表述事物处在产生初期外，偏重于强调事物的幼稚、粗糙与不完备性，以与该事物的正式发展阶段相区别。我们知道，佛教传统认为，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起，佛教就已经佛、法、僧“三宝具足”，有了完备的形态。实际上，佛教在其初期阶段，的确已经具备一个宗教所需的各种基本要素，并非等到以后的某一个时期，等到某种新的因素加入之后，佛教的形态才真正趋于完备，才成为正式的宗教。因此，用“原始”一词来定义佛教的初期阶段，在内涵上有一定的偏差。

“初期佛教”与“早期佛教”这两个名词，都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的角度来定义这一时期的佛教，两者基本等价。不过，与“早期佛教”之完全从时间的先后着眼不同，“初期佛教”还强调了这一阶段的初始性，更为准确。

综上所述，我主张采用“初期佛教”这一名称。

二、初期佛教的基本特征

（一）宗教性

初期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自然具有宗教性，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不必再进行讨论。其实不然，正是在这个重要

的问题上，学术界、佛教界曾经有过不同的意见。至今也没有完全统一。

例如，初期佛教主张世界是自存的，否认有创世神的存在。有的研究者便据此认为佛教是“无神论”，并由此推论：“宗教的本质是相信上帝，而我们在佛教中所看到的却是一个无神的宗教的惊人现象。因而有人倡议应当修改宗教的定义才能适应佛教。另一种合理的倡议，就是改变对早期佛教的态度而不亟亟于认为佛教是宗教。像苏联彻尔巴茨基就这样说：‘佛教历史初期的主要思想，就是初转法轮，很难说它是代表一个宗教。’”^①

我认为，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无神论的理解问题；一是部分研究者的思维模式问题。

佛教不承认创世神是否就等于无神论？究竟什么才叫无神论？关于这些问题，我已经在《有神论与宗教》一文中阐明了自己的观点^②，在此没有新的补充。所以，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思维模式问题。佛教是无神论这一论点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西方学者治学的文化背景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是一神教，信奉唯一的神——上帝。在他们的概念中，神，就是上帝。上帝具有创世、主宰等属性。在西方学者看来，所谓“有神论”，就是主张有一个像上帝那样的创世神。从这种思维定式出发，他们自然对佛教这样没有创世神的宗教感到惊诧莫名。但是，在东方人的心目中，一切超验的存在

^① 虞愚：《释迦牟尼所处的社会和他的思想学说中的几个显著的特色》，载《现代佛教》，1959年第九期。

^② 参见方广钊：《有神论与宗教》，载《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1年第二期。

都被视为神灵。其中既包括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孙悟空，也包括各种花鬼蛇妖。而是否“创世”，是否“主宰”，并非东方文化赋予神的唯一属性。因此，西方学者站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上，用西方思想的框框来套东方的思想体系，不可能不出岔子。近代科学意义上的佛教研究是由西方学者开创的，西方学者的治学方法与他们的学术观点乃至思维模式一起传入中国，影响了部分中国学者的思想方法。现在应该是扭转在佛教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影响，澄清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什么是宗教？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崇拜固然构成宗教的必备要素，对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描述与追求更使宗教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当这种追求不是企求让超自然力量来干预现实世界，以让自己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某种现实的利益；而是企求让自己脱离现实世界，抵达冥冥中的超自然境界；宗教的作用才算真正发挥到了极致。初期佛教正是如此。

初期佛教主张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一个彼岸世界——涅槃，他们以涅槃世界的清静、圆满与永恒，来否定现实世界的基本价值，从而要求人们抛弃现实世界的生死，追求彼岸世界的涅槃。初期佛教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讲，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能比了却生死更紧迫、更重要。因此要求人们抛弃身内、身外的一切，集中精力，努力修行，趋于解脱。马克斯·韦伯把佛教归为逃避现世类型，起码就初期佛教来说，是完全正确的。

追求涅槃是初期佛教全部教义最精华的部分，也是初期佛教宗教性最集中的反映。

（二）践行性

从初期佛教的宗教性生发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的践行性。

宗教讲的是信仰，而信仰就要践行。这本来似乎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有过不同的意见。有的研究者著文称释迦牟尼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我认为，在初期佛教的教义中的确包含一些思辩的成分，一些理论的色彩，甚至一些哲学的因素。但是，就其总体而言，它思辩的成分是很粗糙的；它理论的色彩是很淡薄的；它哲学的因素尚处在萌芽状态。在初期佛教的体系中，宗教践行的因素要远远大于哲学思辩的因素。其实，释迦牟尼并不注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对玄奥的理论思辩。这种态度，在《中阿含·箭喻经》中表述得极为清楚。在他看来，生死事大，人的精力应该全部集中在宗教修习上；再说形而上的问题本身是超言绝象的，这些问题不能靠语言去说明，而要靠宗教修习去体证。所以，他创立的业感缘起论、四谛、八正道等学说都与比丘的修行解脱紧密相关。为了保证教团的宗教修习不受干扰，释迦牟尼制定出一整套比丘的修习规范与生活规范。可以说，整个佛教教团的存在与运作，完全是为着保证比丘个人的修习与最终的解脱能够顺利进行而服务的。这是我们在进行初期佛教教团研究时必须予以注意的问题。

初期佛教的宗教性与践行性源于比丘的个人解脱的要求，保证了比丘个人解脱的“实现”。但带来的问题是使比丘与教团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所以后来大乘批评小乘“只知自利，不知利他”，大乘菩萨运动以“普度众生”为口号，

揭开了佛教史上新的一页。

三、初期佛教与种姓制

近代以来，许多著作与论文都谈及初期佛教与种姓制的关系。论述者一般都认为，释迦牟尼反对种姓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有的论著甚至因此把释迦牟尼视为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废除种姓制度的理想。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近代印度的贱民，在印度宪法起草人安培德卡尔的领导下，掀起大规模的贱民改信佛教运动。其实，这完全是对初期佛教的一种误解。

释迦牟尼的确反对婆罗门教所主张的四种姓分立制度，尤其反对婆罗门至上的观点。与主张人们生而不平等的婆罗门教的四种姓制度相比，初期佛教承认所有的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的，这显然具有积极意义。无视或抹杀这种积极意义自然是错误的。但我们必须联系婆罗门教与初期佛教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来分析这一问题；联系当时婆罗门教文化东进与沙门思潮的反弹来考察这一问题；联系恒河中下游一带当时普遍存在的刹帝利、上层吠舍与婆罗门的激烈斗争的背景来看待这一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正确地认识佛教“四姓平等”口号的实际意义。

首先，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北印度，正处于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兴起的激烈动荡中。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国，当时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不少研究者都指出，释迦牟尼从当时的活跃着的原始社会形态中汲取养料，用于佛教教团的建设，从而使得佛教教团表现出一定的民主因素，这无疑是正确的。所以，释迦牟尼主张“四姓平等”，实际也渊

源于原始社会中人人平等的现实，这可以说是“四姓平等”理论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婆罗门教的发源地西北印度的社会发展形态比迦毗罗卫等地先进，早已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古印度的种姓分立实际是奴隶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就当时而言，奴隶社会的出现乃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既然如此，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四姓平等”说无论体现了创立者多么善良的愿望，凝聚了人类多么美好的感情，如果说它在当时有什么社会作用的话，这种社会作用自然只能是消极的。

其次，在西方传入的奴隶制及婆罗门教的冲击下，恒河中下游一带的社会这时正处在激烈的变动中，也出现了一批奴隶制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新兴的国王阶层与上层富商占据着社会的上层。而西方传来的婆罗门至上主义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在这一背景下，恒河中下游一带出现一股强大的反对婆罗门教、反对婆罗门至上的思潮，即所谓“沙门思潮”。初期佛教也属于这一沙门思潮。初期佛教与刹帝利国王以及上层富商吠舍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释迦牟尼的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制度，反对婆罗门至上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次，释迦牟尼的确主张“四姓平等”，但这一命题实际是“众生平等”理论的自然推衍，只表述了一切众生都是四大五蕴所成，从自然本性上说是平等的这么一层意思。由于释迦牟尼在讲“四姓平等”的同时，又用业感缘起论解释了社会不平等的成因及其合理性，因此，他的“四姓平等”论并不具有实际的社会平等意义。相反，由于业感缘起论为现存的社会秩序辩护，由于它要求人们到佛教教团中、到彼岸世界中寻求最终的平等，因此，毋宁说它的社会作用实际

是消极的。佛典说：“如来教法中，不问于族姓。但观过去世，所作善恶业。”^① 讲的就是这层意思。

所以，如果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撇开其它各方面的因素，单纯就事论事，则主张人与人的平等总比主张人压迫人要好。从这一点上讲，可以说佛教的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它成为近代印度贱民运动的一面旗帜。但是一切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就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历史在污秽与血中前进，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悲剧不断产生的根源之一。

四、研究课题与方法

初期佛教研究是一个大题目，应该而且可以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课题，分别研究。

我认为大体可以把初期佛教研究分解为如下五个课题：

1. 初期佛教的典籍研究；
2. 初期佛教的历史研究；
3. 初期佛教的思想研究；
4. 初期佛教的教团研究；
5. 初期佛教的人物研究。

限于文章的篇幅，此处不拟对上述五个课题展开论述。仅就如何展开初期佛教研究问题简单谈谈看法。

初期佛教是印度佛教中已经为人们研究得比较多的一个领域。要有新的突破，首先在原始资料上应该有进一步的开

^①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九。载《大正藏》，第23卷第674页下。

拓。以往，我国在进行初期佛教研究时较为注意汉传资料的利用，对南传佛教的资料则开发利用得不够。最近，这一情况开始有所改观，研究者开始直接利用南传佛教的资料来对初期佛教进行描述^①。当然，如何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则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国外的研究比较注重南传资料的利用，但对汉传以及藏传资料则有所忽视。全面地利用所有的原始资料，应该能够使我们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另外，近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大批佛教文物与碑铭被发现，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值得充分重视。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可以进一步改进。自从比较研究勃兴以来，已经有研究者从事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等等。我认为，将佛教与它同时代、同地区活动的其它宗教，如婆罗门教、六师外道进行比较，可能更有现实意义。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耆那教，它与佛教不但时代相同、地区相同，阶级基础也相同。因而两者在学说方面有许多相同点，值得我们认真比较研究。另外，可否利用电脑对佛典进行数理统计，从而研究其年代与派别归属？这起码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问题。再次，虽然初期佛教是人们研究得较多的领域，但其中仍有不少空白有待填补。如阿难逝世以后，部派分裂以前的历史就是一例。当然，凡属空白，均为难点；这就需要我们花费更大的气力。应该说，我们的前辈已经为我们开创了比较好的基础，只要努力去做，我们完全可以在前辈开创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成绩，在这里，我

^① 参见郭良鋈：《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